

家庭变迁视野下的日本青少年蛰居

■ 师艳荣 孙 丽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天津 300191;河北大学 期刊社,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蛰居是部分日本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家庭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蛰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日本在向现代化发展的急剧转型过程中,家庭形态、家庭关系及家庭教育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核心家庭化的家庭形态及随之形成的小家庭主义,淡化了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父权失坠”和“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导致父亲角色严重缺失,而母子关系过于亲密引发的娇纵、溺爱及过度保护等问题助长了孩子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自立;偏重智育的家庭教育使得青少年背负着过重的学习负担和精神压力。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和家庭环境的改变,逐步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使家庭沦为青少年蛰居的温床。

【关键词】家庭变迁 日本青少年 蛰居 核心家庭

蛰居是指由于社会性原因,回避社会活动(包括上学、就业及家庭外的人际交往等),自我切断与他者的联系包括家庭关系,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病理现象,蛰居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蛰居者在正常的社会化中断或受挫后,开始逃避学业和工作,逐渐远离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最终成为依靠父母供养的寄生族。蛰居的诱因错综复杂,家庭问题、校园暴力、工作受挫、沉迷游戏、性格孤僻等,其中,家庭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蛰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后日本在向现代化发展的急剧转型中,家庭形态、家庭关系及家庭教育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核心家庭化的家庭形态及随之形成的小家庭主义,淡化了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父权失坠”和“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导致父亲角色严重缺失,而母子关系过于亲密引发的娇纵、溺爱及过度保护等问题助长了孩子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自立;偏重智育的家庭教育使青少年背负着过重的学习负担和精神压力。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和家庭环境的改变,逐步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使家庭沦为青少年蛰居的温床。

收稿日期:2016-07-10

作者简介:师艳荣,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日本青少年问题;
孙 丽,河北大学期刊社《日本问题研究》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日本社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史视野下的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课题编号:TJSL15-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核心家庭化背景下的家庭形态

核心家庭化是战后日本家庭结构的典型特征之一。所谓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是指由夫妇和未婚子女组建的家庭,是家庭形态中最普遍的家庭模式。包括三种类型:一对夫妻组成的家庭;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父母中的一方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日本家庭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战前,居主导地位的家庭形态是以父系家长制、家督继承制^①和男尊女卑为核心的直系家庭。战后的民主化改革,从法律和制度上废除了传统家族制度,确立了尊重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为原则的新型婚姻制度和家族制度。

在传统家族制度下,三代同居大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态。不过,因家督继承制的存在,未能继承家业的儿子成年后需要独立谋生,组建自己的小家庭。由此形成的核心家庭在战前已占有一定比例。1920年,日本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核心家庭已占59.1%^②。战后,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及产业化、都市化的快速发展,家庭的流动性增强。以应届毕业生为主的大批年轻人,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日本称之为“集团性就业”)。这些涌入城市的年轻人成为产业社会的工薪阶层及核心家庭的主力军。传统大家庭随之瓦解,核心家庭在亲属家庭中的比例不断提高,1955年为62%,1960年为63.4%,1970年为71.4%,1975年为74.1%,1980年为75.4%,1985年为75.9%,1990年为77.6%,2000年为81.2%,2005年为82.7%,2010年达到84.6%^③。从上述数据来看,1920-1955年的35年间,核心家庭比例仅提高了约3%;1955-1975年的20年间,却上升了12.1%,这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产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可见,家庭形态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加快了传统大家庭解体的步伐。此后,核心家庭比例一直呈增长趋势,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家庭形态。

与此同时,出生率的持续走低使得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关系简单化。战后以来,除两次“婴儿潮”^④之外,日本的出生率持续走低,一名女性从生四五个孩子,逐渐减少到两三个孩子,进而发展到只生一个孩子,甚至不生孩子。出生率的下降使得家庭规模呈现出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1952-1965年日本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数基本维持在4-5人的水平,1966-1989年减为3-4人,1990年至今则降至2-3人,2014年已减少到2.32人^⑤。

核心家庭化背景下,日本人的家庭观念逐渐从传统的大家庭主义^⑥向小家庭主义^⑦转变。与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不同,战后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增强。日本社会学家日高六郎指出“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人的意识发生了从‘灭私奉公’到‘灭公逢私’”^[1]的变化,追求个人幸福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后,生活的富裕、地域共同体的解体、核心家庭化及家庭规模的缩小为小家庭主义的诞生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家庭生活中的“小家庭主义”随之登场。专职主妇中出现了“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一切都是我的东西”^[2]的小家庭观念。追求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已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目标。

① 在数个子女当中,只能由一个人继承家长权、家业与家产的大部或全部,还要继承牌位、墓地等等。虽说家督的本意是指长子,但日本的“家督”却不惟长子,有可能是次子,也有可能是养子、婿养子。参见李卓:《从家到家庭:跨越三个时代的艰难历程——日本家庭关系演变对照》,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8期。

②③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集(2015年)》表图一览(Ⅶ.家庭):表7-11 家庭类型家庭数及比例:1920-2010年计算得出的数据, <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5.asp.chap=7>

④ “婴儿潮”指一段时期内新生儿人口激增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了两次“婴儿潮”,第一次是1947-1949年,第二次是1971-1974年。

⑤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集(2015年)》表图一览(Ⅶ.家庭):表7-7 居民基本台账的家庭数及平均家庭人员:1952-2014年计算得出的数据, <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5.asp.chap=7>

⑥ 日语为『マイホーム』,是指家庭至上,享受自己小家庭生活的“主义”。

然而,核心家庭化及随之形成的小家庭主义淡化了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在产业化和都市化的大潮中,传统的家庭纽带关系发生了裂变。年轻人离开父母奔赴大城市,在为事业打拼的同时组建起自己的小家庭。与祖孙三代人共同居住的大家庭存在明显区别,城市中打拼的小家庭与远在乡下的父母逐渐疏远,与农村中亲属的联系越来越少,血缘亲情逐渐淡化。而在城市中出生长大的孙辈与祖辈的感情更加淡薄。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故事》(1953年)讲述了战后日本传统家庭的裂变和亲子关系的疏离。故事发生在战后50年代初期,生活在广岛县一个名为尾道的小镇上的两位古稀老人,到东京探望子女,在儿女家小住几日后返乡,不久母亲病逝,子女们从大都市赶回奔丧后迅速回归都市生活。影片用朴实、平常的情节将战后日本家庭形态的变化和家庭纽带的裂变表现得淋漓尽致。都市中子女组建的小家庭,因老夫妇的到来而打破了原有的生活秩序,亲子、祖孙间因生活节奏和住所等问题出现了一些矛盾。亲子之情、祖孙之情的淡薄一目了然。这种由经济发展和都市化带来的传统大家庭的崩溃和血缘亲情的疏离,成为战后日本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和无法回避的痛楚。

核心家庭本身带有封闭性和孤立性,且小家庭主义背景下形成的私生活优先价值观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外的交流。企业社会形成后,大城市周边建立了很多新兴住宅区,生活在这里的核心家庭之间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人际交往。特别是日本社会富裕后,个人主义膨胀,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心理及保护隐私意识的增强,使得都市邻里关系日渐疏离。再加上高度城市化后,生活节奏加快,便利店的普及和服务业的发展使得以往相互帮助的必要性降低,邻里之间疏于往来,人际关系愈发淡薄。“在几乎能够用货币购买所有服务的社会里,亲戚之间的往来不是必需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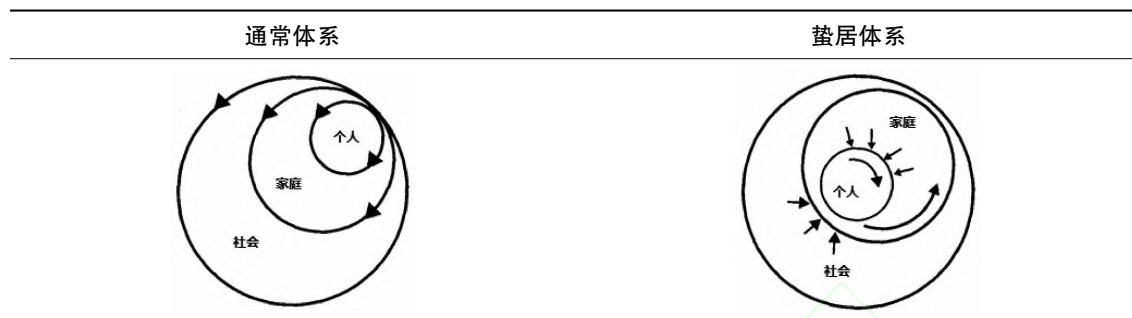
这种因血缘和地缘关系弱化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是蛰居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青少年蛰居现象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此时的日本已步入核心家庭时代,核心家庭的封闭性本就不利于儿童人际关系的培养,小家庭主义背景下日渐疏离的邻里关系更是阻碍了儿童与左邻右舍的交往,直接影响到其地缘关系的构建。儿童的社会化离不开与同龄人的交往,幼时玩伴在儿童人际关系培养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伴随着都市化的发展、邻里关系的淡薄和少子化的加剧,日本儿童的同龄玩伴越来越少,独自玩耍的孩子增多。孩子们业余时间基本上宅在家里,日本儿童的孤独、寂寞可见一斑。

核心家庭化引发的人际关系危机使得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人际交往减少,不外出和拒绝与人交流正是蛰居者的典型特征。在日本,一些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青少年,出现了精神颓废、自信心缺失、对人恐惧等症状。他们不仅逃避学业和工作,就连最基本的人际交往也避而远之,甚至完全封闭自我,在堆满垃圾、房门紧闭的房间内,不理发、不洗澡,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用餐时需要母亲将饭菜送到门口,待母亲离开后才食用。这种蛰居者的生活空间基本局限在卧室里,断绝了与家人及外界的联系,整个人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隔绝状态中。

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认为,“社会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社会”。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然而,蛰居者却脱离了社会,拒绝人际交往,与家庭和社会出现了背离,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封闭。对此,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第一人斋藤环从人际关系的视角,对蛰居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剖析,并从理论的深度提出了蛰居的体系模式(见下页图)。可以看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体系中,通常情况下三者之间存在交界点,通过交流实现相互间的联系和互动;而蛰居后,三者之间变得各自独立,没有了连接点,交流也随之消失。在社会不断施压于家庭,家庭施压于个人的过程中,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可见,蛰居问题的本质在于人际关系缺失。

综上所述,核心家庭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核心家庭化及随之形成的小家庭主义,淡化了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家庭的闭塞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使得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变

得单调寂寞。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缺失不仅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而且成为蛰居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蛰居体系模式图

资料来源:斋藤环:《社会性蛰居:未结束的青春期》,东京:PHP研究所1998年版,第101页。

二、“父权失坠”和“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

“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是战后日本家庭结构的另一典型特征。在日本历史上,除了贵族家庭外,普通家庭基本上都是夫妻共同劳动。战后,伴随着现代家庭制度的确立,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产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工薪家庭迅速增多。为了保障男性能够全身心地工作,政府鼓励已婚女性回归家庭,照料子女,并在纳税、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主妇家庭倾斜。在工薪家庭中,父亲的职责是在外工作,挣钱养家;母亲则主要料理家务,持家育子。妻子主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但是,这种角色分工在保证家庭稳定的同时,所形成的“父权失坠”和“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却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

“父权失坠”是战后日本家庭关系的特征之一。战后日本社会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少年问题是学校恐惧症,即学生害怕上学及逃学等。调查这些问题时人们发现,家庭生活中父亲对他们的影响很小或父亲几乎在外不归^[4]。在这种家庭角色分工模式下,日本的丈夫绝大多数视工作比家庭重要,工作第一是他们的行事准则。再加上日本企业的长期加班、单身赴任^①等问题,使得父亲无暇陪伴孩子。父亲在家庭中的存在感逐渐淡化,孩子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变得非常模糊。与“工作狂”的丈夫相反,妻子则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父权失坠”的同时,“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得以确立。很多日本家庭,以孩子出生为分界线,家庭关系从夫妻为中心向母子为中心转变。夫妻间的称呼也随着孩子的降生而改为“孩子爸、孩子妈”。孩子出生后,母亲将爱和关心都倾注于孩子身上,父亲则从母子关系中撤离。对于生活重心全在孩子身上的家庭主妇来说,孩子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母亲的神经,容易出现对孩子的过度干涉。

“父亲角色缺失,母子关系过密”的家庭环境对孩子人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青少年蛰居问题出现的诱因之一。在日本家庭中,“父权失坠”问题严重,很多青少年是在父亲角色缺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家庭角色分工将父亲的本职定位于挣钱养家,加班、聚餐等公司事务成为父亲晚归的正当理由。长此以往,父亲逐渐脱离了家庭生活,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落在了母亲肩上。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缺失无疑影响到子女的成长,不利于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容易出现胆小、不自信等性格问题。因此,父亲角色缺失成为一些青少年性格懦弱、抗挫折能力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母子关系过于亲密引发的娇纵、溺爱及过度保护等

① 单身赴任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日本特有的工作方式,指公司职员被调派到比较远的工作场所时,家人不与其同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日本,因“单身赴任”带来的亲子分离特别是父子分离现象十分普遍。

问题助长了孩子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自立。

日本独特的家庭角色分工即妈妈担当教育角色,使得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了更为亲密的关系,母子关系代替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日本的家庭教育基本上以主妇为中心开展,持小家庭主义观念的母亲在教育问题上往往会出现对自我能力的过于自信。在自我主义支配下,母亲将孩子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下,限制孩子与朋友玩耍,这不仅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且使孩子的依赖心理增强,独立意识减弱。孩子从小对父母言听计从,宛如母亲的“宠物”一样,失去了自我和独立意识,形成了性格温柔、体贴、不反抗父母的“好孩子”形象。但是,这种“好孩子”很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即便是成年后,一旦遇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也很容易打退堂鼓,难以自立。2014年,一位蛰居者的父亲——春乃良文,根据其儿子从受到校园欺凌,到不登校(中小學生拒绝上学),最后走上蛰居之路的长达18年的真实经历,撰写了《不登校、蛰居的原点和解决方法》一书,指出蛰居的根源在于“不恰当的育子方法”^[5]。春乃良文的儿子在母亲的过度干涉和保护下,最终走上了蛰居之路。可见,母亲对孩子的过度干涉使得孩子从小缺乏主见和独立意识,抗挫折能力也弱。而且,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母亲的过度保护更容易让青少年失去适应社会的能力,甚至出现不能离开母亲的孩子。

综上所述,在日本独特的“父权失坠,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中,父亲角色缺失,母亲过度干涉的家庭环境不利于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养和自立意识的形成。这种家庭关系不仅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而且成为青少年蛰居问题出现的家庭根源之一。

三、偏重智育的家庭教育

学历社会是战后日本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传统家庭手工业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产业社会的形成。上好学校,进大公司,努力成为工薪阶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理想选择。生活富裕后,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随之提升,希望孩子拥有高学历的愿望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不断提高,1955年、1965年、1970年的高中升学率分别为51.5%、70%、82.1%;大学升学率分别为7.9%、12.8%、17.1%^[6]。在整个社会强调学历的氛围下,学历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

学历社会中考试竞争异常激烈且低龄化。为了考入名牌大学,实现进入大公司或成为公务员的目的,很多孩子从小学就被卷入了激烈的考试竞争中。孩子们拼命学习,各种与正规学校教育完全不同的补习班(私塾)不断增多,甚至成为第二学校。新闻媒介将这种情况称作为“乱塾时代”。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在从1976-1993年的17年间,小学六年级学生上私塾的比例从26.6%上升至41.7%;初中三年级学生上私塾的比例则从37.4%升至67.1%^[7]。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父母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补习班成为孩子们课余的主要去处。然而,无休止的补习班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外时间,使很多学生不堪重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学生因此而产生考试焦虑、厌学情绪以及学校恐惧症。因学业负担重而蛰居的事例屡见不鲜。如B君上小学三年级时,想踢足球的他却被父母强迫上补习班。以此为契机,B开始了不登校和长达20年的蛰居生活。期间,B断绝了与父母的语言交流,只通过便签留言方式与父母沟通。不和家人一起吃饭,而是母亲将饭菜放在门外,待母亲离开后端到房间内,锁上门食用。洗澡也尽量选在母亲外出不在家的时候^[8]。

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下,偏重智育是战后日本家庭教育的典型特征。日本步入现代化社会后,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从升学、就业到升迁,竞争无处不在。人们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不得不尽全力去拼搏。“工蜂”式的父亲疲于奔命地工作,然后获取足够养家的收入。孩子则要努力

学习,上补习班,获取高学历,进入大企业,重复着和父辈一样的生活轨迹。因“男主外,女主内”家庭角色分工的存在,在家庭教育和育儿方面,母亲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父亲。“教育妈妈”由此诞生。而且,随着少子化、社会富裕性和服务便利性的增强,在家务减少的同时,孩子的学业成为家庭大事,培养孩子成为母亲毕生的事业。这也是造成青少年学习压力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高期望值的前提下,父母对孩子的学习过于焦虑。无论是报考志愿的填写,还是考场外的焦急等待,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都给予了过度关注,也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过高的期望和过度的关注使得青少年的压力激增。

蛰居问题的出现与学历主义和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历主义氛围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下,青少年承载着过重的学业压力。早在1956年,学历社会、考试地狱、偏差值教育等问题已经初露端倪。升学考试前,因学习压力过大引发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不断发生。而且,学历社会使得青少年从小开始残酷的能力竞争,周围的人都成为了竞争对手,成为了考试竞争中的“敌人”,朋友越来越少。一旦出现不登校或高中中途退学,自己就会产生挫败感,自我评价降低,甚至出现交流障碍。现有的各种关于蛰居问题的调查表明,由不登校发展到蛰居的情况非常多。

特别是被称为蛰居一代的“团块少年”尤为引人关注。他们的父母作为“团块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60年代出生的、人口稠密的一代)经历过激烈的考试竞争,并通过获取高学历成为人生的赢家。“团块世代”父母偏重智育,忽略了对孩子人际关系能力的培养。因惧怕人际关系而不登校或不就业的年轻人增多了,因此走上蛰居之路的青少年也随之增多。而且,“团块少年”成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而引发的就业难的牺牲品。因人际关系问题和就业受挫而蛰居的年轻人不断增多。

结语:蛰居问题是青少年社会化中断的突出表现。家庭本应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与家人的交流和生活中培养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然而战后的日本,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变迁、核心家庭推崇的小家庭主义、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父权失坠”和“母子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以及偏重智育的家庭教育等问题的出现,影响了青少年独立意识的形成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使得家庭沦为青少年蛰居的温床。蛰居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不能自立,对父母的依赖性非常强,绝大多数与父母同居,成为依靠父母供养的寄生族。然而,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长期蛰居者的生存问题引发关注。很多蛰居者的父母已经退休,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他们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当年迈的父母逝世后,如何解决蛰居者的生存和发展已成为日本社会和家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日高六郎:《思考战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81页。
- [2] 矢岛正见:《战后日本青少年问题考》,东京:学文社2013年版,第110页。
- [3] 橘 玲:《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周以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 [4] 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阎小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6页。
- [5] 春乃良文:《不登校、蛰居的根源和纠正方法》,东京:文艺社2014年版,第10页。
- [6] 山本耕平:《蛰居中成长》,京都:かもがわ2009年版,第35页。
- [7] 河合俊雄 内田由纪子:《“蛰居”考》,大阪:创元社2013年版,第47页。
- [8] 町泽静夫:《蛰居青年——“蛰居”的实况和处方》,东京:大和书房2003年版,第30-31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